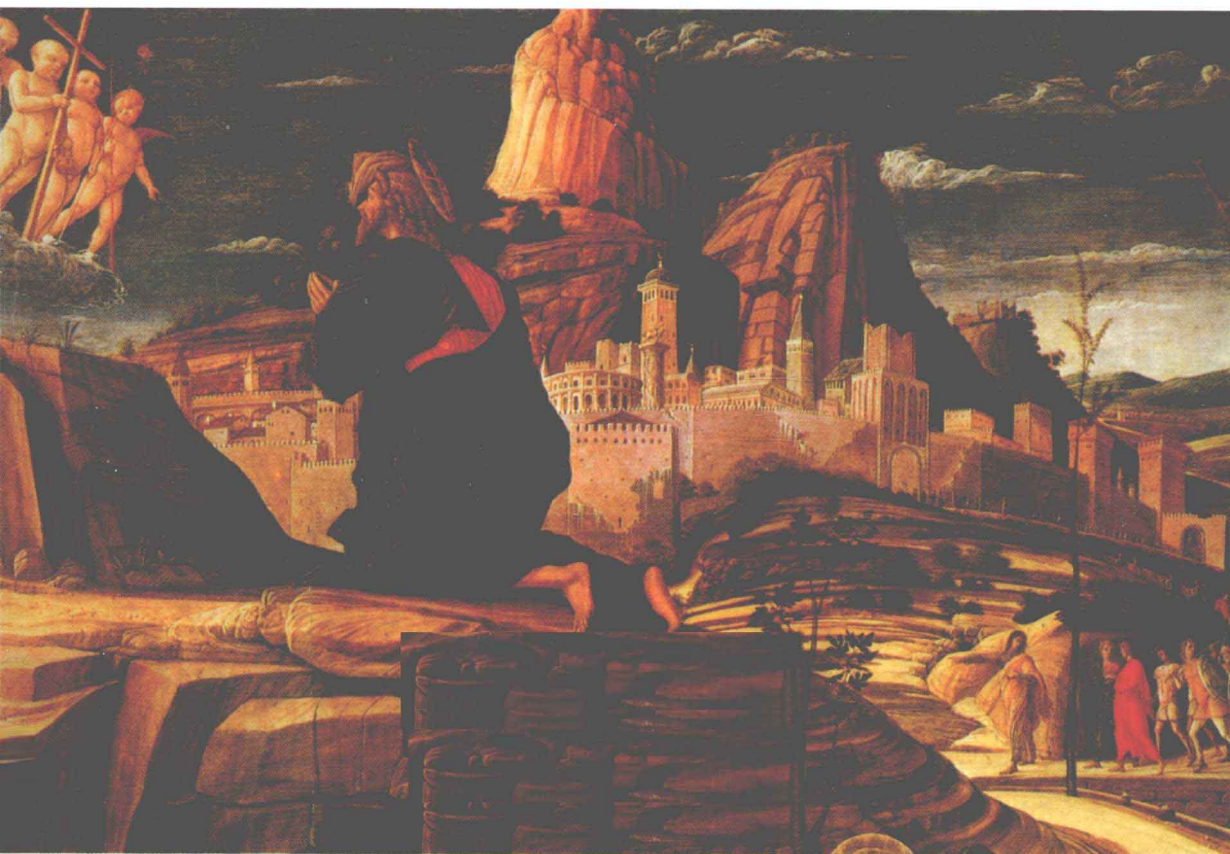


将引领一生的西方智慧大作  
罗素：西方的智慧

XIFANGDEZHIHUI

罗素 著 王畅 译  
(下卷)



# 罗素：西方的智慧

罗素 著 王畅 译

下 册

 中国书标 出版社

## 第七章 近代哲学的兴起



▲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诞生，文艺复兴的象征

十四世纪时，中世纪文明开始出现衰微，一些塑造近代社会的新因素，也逐渐初现端倪。在社会方面，新兴商人阶级日益崛起，他们与君主们联合起来反对那些无法无天的贵族。这样一来，中世纪社会的封建结构岌岌可危了。在政治上，攻城武器的出现，摧毁了贵族们赖以自保的城堡要塞。以前，农民手中粗陋的棍棒和长矛，或许动摇不了贵族们的深垒厚壁，但如今火药却是无坚不摧的。下述四项伟大的运动标志着从中世纪的衰退到十七世纪的伟大跃进之间的过渡阶段。

首先是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但丁虽然仍停留在中世纪的思维方式里，但他却已率先采用本国语言作为工具，从而使得那些不懂拉丁文的普通人也能读写书面文字。随后薄伽丘、彼特拉克等作家推波助澜，形成了回归世俗的思想浪潮。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

在科学上，随处可见人们对古代世俗文化的再度青睐，这标志着与中世纪教士传统的分道扬镳。在中世纪的舞台上，凡事皆以上帝为依据，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却对人本身更感兴趣。于是第二种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应运而生。如果说文艺复兴从总体上直接影响了人民大众的人生观，那么人文主义运动则主要是在思想家和学者的领域内发挥作用。然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并未促成国家的重新统一，意大利国内各个城邦各自为政，无政府状态随处可见。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获得主权独立以前，意大利始终处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控制下。但是，文艺复兴运动仍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逐渐向北传到了德国、法国及低地各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上述这些地区的伟大人文主义学者大约要比他们的意大利前辈晚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这些地方，人文研究是与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兴起的。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改变中世纪文明的第三股重要力量。其实，在教会内部早已有人认识到应该及时进行一些改革。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曾一再批评教会管理中充斥的种种不端行径，但野心勃勃、利欲熏心的教皇势力太大，因此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的批判产生不了什么作用。宗教改革运动一爆发，就受到了罗马教廷的强烈谴责和猛烈攻击。这么一来，原本有可能在万国教会的范围内被施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却因此而被迫陷入孤立。无奈之下，各国发展出了自己的新教教会。等罗马天主教教会自身也开始改革的时候，却为时已晚，无法挽回宗教上的大分裂



▲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

局面。从此以后，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便四分五裂。改革后的各教派，深受人文主义影响。他们接受了人人皆可为神父或教士的观点，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取得联系，而耶稣基督是无需代理人的。

第四个重要发展，直接来自因奥卡姆的批评而复苏的经验研究。奥卡姆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科学领域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其中最重要的是哥白尼重新发现太阳中心说。太阳中心说于1543年问世。自十七世纪以来，物理学及数学的进步真可谓一日千里，通过对技术进步的促进，它们确立了在西方科学中的主导地位。科学传统，除了带来物质利益以外，同时还促进了独立思考。无论西方文明传播到哪里，它的政治理想都会紧随物质扩张的步伐接踵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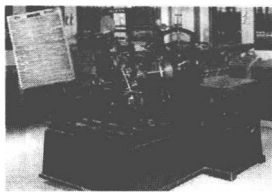
科学探索的兴起所产生的看法，基本上是希腊人看法的再现。从事科学研究，等于就是在顾全解释现象世界。从这些传统中所获得的权威，完全不同于中世纪时教会强加于人的那套独断教义。诚然，一套依靠独断的信仰信条而存在的神圣秩序，确实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对一切事情异口同声，而不管其他爱寻根究底的人有什么不同意见。在某些人看来，整体一致而无异议就标志着自身的优越——尽管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毫无疑问，这样会使那些拥护这样做的人感到一种力量，然而并不足以使他们的态度更加令人信服。正如一个命题，决不会因为宣布它时用的嗓门大些，就变得更正确些一样。探索工作应该尊重的唯一东西就是理性对话的普遍准则，或者用苏格拉底的话来

说，就是辩证法。

但是科学研究应用于科技方面所产生的巨大成就，却也带来了另一种危险。很多人渐渐产生一种想法，以为只要人们努力的方向正确、应用得当，实际上没有人做不到的事情。近代技术的突飞猛进有赖于无数人的群策群力。那些致力于开拓创新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容易忘记这些方案都离不开人的努力，并要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因此在科学的领域中，我们正面临着过头的危险。

在哲学研究上，对人本身的强调，造成了思辨上的转趋内向。沉思非但不会激发崇尚权力的哲学，恰恰相反，人们开始批判自身的内在官能。除了由直接经验所确定的东西以外，一切都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了。如此主观的态度导致了极端的怀疑论，而这种怀疑论本身，和完全忽视个人的趋势一样，同样失于偏颇。显然，我们必须找出一个合乎中庸之道的解决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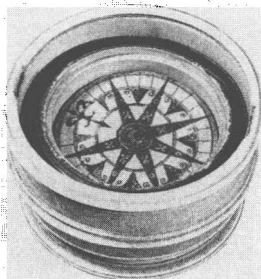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我们所讨论的这段过渡期中还有另两项特别重要的进步。第一项进步是活字印刷机的发明。就西方世界而言，这项发明可以追溯至十五世纪，而中国人早在500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装置了。由于印刷术的改进，新观念传播的范围迅速扩大。该项发明的应用促进了各种旧权威的崩溃，当圣经被译成各国语言，并通过大量印刷而广泛传播的时候，教会再也无法垄断它在信仰问题上的监护权了。至于一般的学术，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加快了向现世主义的回归。印刷术不仅提供了工具，来传播以抨



▲古登堡活字印刷机

击旧秩序为主要目的新颖政治学说；同时还使得人文主义的学者们能够出版各种古典著作的新版本，而新的版本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古典文献的研读，从而大大提高一般教育的水平。

不过，从更深层次上看，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如果探讨的自由不能同时得到保障，那么仅凭印刷术的发明是很难开花结果的。因为谎言和真理同样容易付诸印刷，也同样容易广泛传播。如果一个人对摆在面前的材料毫无疑问地接受，那么这个人的阅读能力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只有在能够自由发表言论和意见的地方，印刷品的广泛传播才会促进探索。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那么我们还不如当文盲。这个问题在我们今日变得更加尖锐，因为印刷不再是面向大众进行信息传播的唯一手段。无线电报和电视发明以来，永远保持警惕甚至更加重要。没有了警惕，自由就开始失去了活力。



▲哥伦布航海中使用的罗盘示意图

随着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对于自己所生活的地球，形成比较合理的认识。这些认识是通过一系列的航海发现而获得的，这些发现为西方的魄力和胆略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通过冒险得来的成就之所以可能，主要应该归功于造船及航海技术的改进，以及对古代天文学说的重新回归。在十五世纪以前，大西洋沿岸的船只从未远离海岸，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深入远洋的必要，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贸然驶入没有陆标导航的区域会很不安全。指南针的应用，开启了世界海洋的大门，探险家们纷纷飘洋过海，探索新的大陆和航线。

对中世纪的人来说，世界是静止的、有限的，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井然有序的。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特定的作用，天上的星辰各自依据固定的轨道运行，而人则安居于他生活的土地上。这幅安详自得的画面被文艺复兴运动扯碎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产生了一种新观点。一方面是对人的力量和独创性的巨大信心，人现在占据了舞台的中心。与此同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变得不再那么居高临下了，因为空间的无穷无尽开始激起哲学家的遐想。对宇宙的这些认识早在德国红衣主教尼古拉·卡萨努斯（1401~1464）时就已经初现端倪，一个世纪之后它们出现在哥白尼的天文学说中。同样，也有人重新捡起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学说，认为世界是建筑在一种数学模型上的。所有这些思考，推翻了事物的现存秩序，动摇了在教会和世俗两个范围内古老的既定权威。教会试图抑制异端的传播，但是不见成效。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即使到了1600年，宗教裁判所还把乔达诺·布鲁诺送上火刑柱。正如之前常常发生的那样，现存秩序的代理人由于害怕颠覆活动，总是会对那些胆敢标新立异的人横加制裁。然而正是这种判决，暴露了他们想要维护的地位是多么不稳。在政治领域内，关于权威的新概念逐渐发展，世袭统治者的权力也日益受到限制。

宗教改革运动也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富有成效的。宗教改革者们原本以为，宗教信仰多元化之后，人们应该会明白上帝是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进行礼拜的。早在宗教改革以前，卡萨努斯就已经倡议过这种观点了。不过，这个十分明显的结论却未能被广大的信众所接受。



诚然，文艺复兴运动也并非是从古代研究从休眠中一下子就觉醒的。事实上，我们知道整个中世纪残存着古老传统的遗迹，历史无疑没有这种明显的分界线。然而，只要处理得当，这种时期划分还是有用的。因此，如果这样来谈论意大利文艺复兴是有道理的话，就意味着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有着某些显著的差别。例如，在中世纪学者们的传教士文学和十四世纪开始出现的用本国语言书写的现世文学之间，就存在着鲜明的反差。这种文学方面的苏醒比人文主义者基于古典传统的学术再生，要更早一些。新文学所使用的是一般民众使用的语言，这比起学者们仍用拉丁文写作的著作，具有更广大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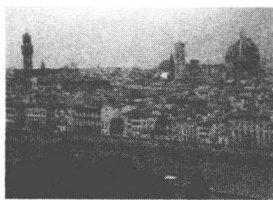
至此，所有的领域都打破了中世纪的种种限制。灵感的源泉，起初产生于当时对世事的关注，继而出现在对古老过去的美好想象。当然，那时候发展出的许多关于古代的看法，多少会被一代人的主观热情所歪曲，因为他们重新发现了历史的某种延续性。这种对古代充满浪漫情怀的看法，一直持续到了十九世纪。对这类问题，今天的我们当然比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作家知道得更多些。

意大利境内古代文明的遗迹处处可见，这为昔日文明的情况提供了实物说明。因此文艺复兴运动在意大利的渊源，要比之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后继者们那里更为久远。在政治上，意大利四分五裂，与古代希腊的情形非常相似：北方有许多各自为政的城邦，中部是教皇的自治领域，南方则是那普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在北方各城中，米兰、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三个城邦实力最强。城邦与城邦之间彼

在近代哲学兴起的背景中有四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经验研究的复苏。此外，两项特别重要的进步也是值得关注的即：活字印刷机的发明和指南针的应用。印刷术不仅提供了工具，来传播以抨击旧秩序为主要目的新颖政治学说；同时还使得人文主义的学者们能够出版各种古典著作的新版本，而新的版本反过来又促进了对古典文献的研读，从而大大提高一般教育的水平。指南针的应用，开启了世界海洋的大门。

此争战不休，甚至城邦本身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尽管人与人之间的阴谋仇杀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但作为整体的国家并未受到致命的损害。贵族和城邦都使用雇佣兵进行厮杀，而后者惟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活命。如此涣散的局面，直到意大利沦为法兰西国王和神圣罗马皇帝交战的战场时，才彻底改观。由于意大利的长期分裂，使其无力抗拒外来入侵。因此，国家依旧是四分五裂，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也长期被外国势力所控制。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拉锯战，最后获胜的是哈布斯堡家族。那普勒斯和西西里沦入西班牙的手中，而教皇的辖区则享受默许的独立。1535年，米兰这个教皇党的据点沦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属地。威尼斯人的处境尤为特殊，这部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败于蛮族之手，部分是因为他们与拜占廷的联系。通过历次十字军东征，威尼斯积聚了武装和财力。在打败了对手热那亚人之后，他们控制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从此威尼斯开始衰落，并且因为通往印度的好望角航道的发现和新世界的开拓而加速了这个衰落过程。后来，由于从好望角通往印度的新航线被发现以及新世界的开启，威尼斯终于一蹶不振。

文艺复兴运动开花结果的地方，首推佛罗伦萨。自古希腊时的雅典之后，从来没有任何一座城市曾经在同一时期出现过那么多艺术家和思想家。但丁、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以及后来的伽利略等人都是佛罗伦萨人。佛罗伦萨曾一度发生内乱，内乱中但丁遭到放逐，该城最终被梅狄奇



▲文艺复兴的诞生地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

家族所统治。从1400年开始，除了几次短暂间断外，这个商贾贵族家族统治佛罗伦萨逾三百年之久。

对于教皇而言，文艺复兴造成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罗马教皇对人文主义学者的学术探索表现出开明的兴趣，他们同时还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庇护者。罗马教皇声称其世俗权力来源于“君士坦丁的馈赠”；而教皇尼古拉五世却对揭穿这个骗局的洛伦古·瓦拉推崇有加，尽管瓦拉有许多离经叛道的观点，但还是被任命为教皇秘书。另一方面，信仰标准的宽松导致了各种各样的世俗偏见，这使得罗马教皇在精神上的影响力大大降低。再加上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等人私生活不检，缺乏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所应具有虔诚；更有甚者，十五世纪历任教皇，多热衷于搜刮钱财，这种种行径惹得怨声四起，终而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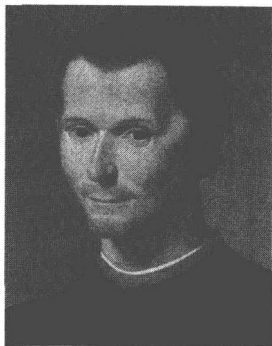
在哲学方面，总的说来，意大利文艺复兴并没有产生伟大的哲学著作。这是一个重新探根寻源的时代而不是哲学玄想的时代，尤其是对柏拉图的研究，再次开始向经院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提出了挑战。十五世纪早期，梅狄奇治下的佛罗伦萨兴建了佛罗伦萨学院。这座学府通过推崇柏拉图来与当时已经存在的各大学相抗衡。总之，人文主义学者的辛勤工作为十七世纪哲学的蓬勃发展铺平了道路。

文艺复兴虽然使人们摆脱了教会的独断教条，却未能免除古老迷信的影响。占星术一直为教会所反对，而此时却又广泛流行起来。不仅目不识丁的无知民众迷信它，甚

至连饱学之士也对它深信不疑。巫术魔法同样在民间广为流传起来，许多离群索居、行为古怪的人，尽管实际上对人无害，却被当作巫师送上了火刑场。当然，这种以不实指控加害他人的行径，在我们现代也不乏其例，只不过我们不会将受指控的人捉去活活烧死罢了。推翻了中世纪独断教条后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不再尊重长期形成的品德和行为模式。尤其是这一点，阻碍了面对北方外国威胁的意大利获得某种形式的国家统一。尔虞我诈和两面三刀风行一时。对竞争者或仇敌的玩弄手段，已经发展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阴险程度。在这样的欺骗与猜疑的风气里，不会产生有活力的政治合作形式的。

但政治哲学的领域中，意大利文艺复兴却造就了一位杰出人物；他就是尼科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他是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儿子，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494年梅狄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城的时候。这时左右城中大局的是多米尼克派改革家萨万纳罗拉，他是意大利的宗教家兼社会改革者。萨万纳罗拉嫉恶如仇，力谋革新，并且猛烈抨击当时的种种罪行和腐败现象。后来他得罪了鲍吉亚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并于1498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许是这些事件引起了人们关于权力本质及政治成败的反思，后来，马基雅维利就以萨万纳罗拉为例来说明“赤手空拳的预言家总是难逃失败的命运”的道理。在梅狄奇家族遭放逐期间，佛罗伦萨实行了共和政体，而马基雅维利在共和政府中任了职，直到1512年梅狄奇家族的势力重新返回佛罗伦萨。由于马基雅维利在任职期间抨击了梅狄奇家族，

文艺复兴不是在哲学上有伟大成就的时期，但是也做出了一些事情，对伟大的十七世纪来讲是必要的准备。首先，文艺复兴运动摧毁了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恢复了对柏拉图的研究，并再次开始向经院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是文艺复兴运动鼓励把知识活动看成是乐趣洋溢的社会性活动，从而破除了经院哲学在知识问题上的遁世幻想。



▲《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

因此遭到了罢黜。在被迫退出政坛之后，他专心于撰写政治哲学及其相关问题的著作。为了重新讨得梅狄奇家族的欢心，1513年他将自己的名著《君主论》献给了洛伦佐二世，结果徒劳无功。他死于1527年，就在这一年，皇帝查理五世的雇佣兵团洗劫了罗马。

马基雅维利的两部主要政治著作是《君主论》和《史论集》。前者详述了获取和维护专制权力的方式和手段，后者则对不同类型的统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进行了概括研究。《君主论》一书中的理论根本没有打算为如何做一名有道明君提供道德忠告；相反，它承认某些罪恶的手段有助于获得政权。正是因为这样，后世的“马基雅维利”一词多少有阴险狡诈的含义。平心而论，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把罪恶提倡成原则。他所探讨的领域，正像核子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一样，是超乎善恶之外的。他想论证的是：如果你想要取得政权，就必须毫不留情，至于这样行事是好是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马基雅维利的研究兴趣并不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挑他的毛病，批评他未能重视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去谴责他对于事实上存在的强权政治进行研究，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君主论》一书所记载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坛的一个缩影而已。

马基雅维利在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公职期间，曾多次出国进行各种的外交活动。这使得他有很多机会亲身体察各种错综复杂的政治阴谋。在外交工作中，他和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凯撒·鲍吉亚混得很熟，后者与其父一样无恶不作。老谋深算、野心勃勃的凯撒·鲍吉亚计划在父亲去

世之后确保自己的权势。在实现野心的过程中，他的同胞兄弟因为挡了他的道而惨遭铲除。在军事上，凯撒名义上帮助他父亲扩充教皇的属地，实际上却打算日后将这些地方变成自己的领地。至于教皇的继承问题，他必须千方百计使自己的朋友坐上这个宝座。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凯撒·鲍吉亚施展出惊人的聪明才智和外交手腕，他时而假装友善，时而又痛下杀手。那些在权谋运用下惨遭牺牲的政界人士感受如何，外人当然无从得知。但是当他们从局外人的观点来看时，他们很可能对凯撒·鲍吉亚灵活机动的政治手腕佩服地五体投地，而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然而，最后鲍吉亚的计划却落空了，1503年当他的父亲过世时，鲍吉亚本人也病倒了，而教皇的继承者是鲍吉亚的死敌尤里乌斯二世。单就凯撒·鲍吉亚的种种野心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说他非常能干。也正因如此，马基雅维利对他相当称赞。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就认为鲍吉亚是热爱权力者的楷模。在马基雅维利看来，鲍吉亚的阴谋诡计是经得住辩驳的，因为它符合时代的普遍标准。总的说来，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这类冷漠无情的政治手腕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宽恕，至少没有受到人们的公开赞许。不幸的是，二十世纪再次产生了实践马基雅维利传统的政治领袖。

从1513年到1521年，教皇的位子由列奥十世占据着。列奥十世来自梅狄奇家族，为了讨好梅狄奇家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故意规避教皇权位的问题，代之以若干故作虔诚姿态的陈词滥调。不过到《史论集》中，马基



▲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凯撒·鲍吉亚，马基雅维利推崇的统治者

雅维利对教皇制度的看法已经比较具有批判性。这本书在整个取向上偏重伦理，并提出了不少伦理观念。马基雅维利认为，从宗教创始人到最初的暴君，各种不同类型的掌权者都应当以功绩大小来加以评判。对于宗教在国家中的作用，马基雅维利抱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只要国家能取得相当的社会凝聚力，宗教信仰上的真诚也好、虚伪也好，这些都并不重要。依据这样的看法，处决异教徒自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至于罗马教会，马基雅维利认为它有两大罪状值得谴责：第一，神职人员罪恶的生活方式已经动摇了民众对宗教的信心；第二，教皇染指世俗及政治事务，从而成为意大利全国统一的巨大障碍。需要说明的是，《君主论》并不关心掌握权力的目的是什么，而《史论集》却有时候会注意这一点。

《君主论》明确宣称统治者不应该受约定俗成的道德标准的约束。除非为了权宜之计需要遵守道德法则，否则没有什么道德法则是统治者不可违犯的。事实上，如果统治者想要巩固权势，往往也必须如此。同时，在他人面前，统治者要装得道貌岸然。只有靠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一个统治者才能稳坐江山。

在《史论集》的讨论中，马基雅维利还阐述了制约与平衡的理论。社会各阶层都应该拥有一定的法定权力，以便可以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这一理论可以直接追溯到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后经十七世纪的洛克、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而发扬光大。因此，马基雅维利不仅影响当时的一些专制领袖们的实际行动，还影响了近代自由主义政治

哲学家们的学说。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权术，被许多人无所不用其极地付诸行动，尽管这其中有些马基雅维利始料未及的局限性。

十五世纪影响意大利全境的文艺复兴运动，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影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但是在向北传播的过程当中，文艺复兴的意义和效力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在北方只有学者才关心新观念。严格说来，将北方发生的文化运动称之为复兴是不恰当的，因为北方并没有什么曾经存在而如今又需要予以复兴的文化内涵。对南方的一般民众而言，过去的传统确实有某种隐约模糊的意义；但在北方，古罗马的影响也只是一时的，甚至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北方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在学者们的领导下展开的，而它的影响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在艺术领域中，北方的人文主义无从作同样的发挥，因此呈现出较为严谨的面貌。到后来，它与中世纪权威之间的决裂，却比在意大利更为决绝而令人赞叹。尽管北方的许多人文学者并不赞成由于宗教改革而造成的宗教分裂，但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预见，在北方文艺复兴之后，这种分裂迟早会接踵而至。

自文艺复兴以来，宗教信仰在民众生活上的作用，在阿尔卑斯山南北两侧是极不相同的。在意大利境内，教皇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与过去传统的直接联系，至于宗教仪式本身，则是一项例行公事，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意大利宗教活动中的宗教仪式，比其他遵奉相同信仰的地方，保留了不温不火的特殊风格。意大利

列奥·施特劳斯曾经把霍布斯认定为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后来施特劳斯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他是犯了错误的。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才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正是从马基雅维利开始，政治才被当作一个研究对象加以不偏不倚地（超乎善恶之外）科学研究的。至于如何评价他的强权政治理论，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人不可能和原有的宗教传统完全隔断的理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是整个体制的一部分，甚至像马基雅维利所指出的，教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意大利民族统一的一项障碍。第二，宗教信仰原本就没有那么深挚和坚定，所以即使有所改变，也不会造成那么极端的改变。然而，北方的人文主义学者与思想家们，却以较严肃的态度关心宗教以及宗教的种种弊病，他们在著作中，毫不留情地批判罗马教廷的卑劣行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意大利的主教们没有充分估量到的民族自豪感。在为修缮罗马城而进贡纳税等问题上，北方的条顿人对意大利人普遍不满，因为，精明灵活的意大利人在严肃认真的条顿人面前总是摆出一副恩赐的姿态。

北方最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首推鹿特丹的爱拉斯摩（1466~1536）。二十岁时，他父母双亡，因此他无法顺利进大学读书，监护人把他送进了一所修道院学校，随后又让他加入斯泰因地方一个崇尚奥古斯丁学说的修道院中。这些早期的经历，使他对强行灌输给他的经院哲学深恶痛绝。1494年，爱拉斯摩被冈布雷大主教任命为秘书，从此爱拉斯摩脱离了在斯泰因的隐居生活。接着，他多次造访巴黎，然而巴黎大学神学院当时的哲学气氛，已经不再能够进一步促进新的学术研究了。因为，面对文艺复兴的冲击，托马斯派和奥卡姆派已经握手言欢，联合起来抵制人文主义学者。



▲《愚人颂》的作者爱拉斯摩

1499年底，爱拉斯摩到英国短暂游学，在那里他遇见了克利特，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结识了莫尔。回返欧洲大陆